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七二期 ——
(二〇〇七年五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5b)

【史海钩沉】文革初期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考	余汝信
【研究探索】“文化大革命”八十问	王年一
【文革一页】“文革”时，我被囚于秦城监狱	李敦白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文革初期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考

• 余汝信 •

1966年6月至9月召开的中共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体会议，是文革初期关系军内海、空两军种领导权之争的两次重要会议之一（另一为差不多同时举行的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会及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对于这次会议，文革结束后学术界及亲历者各有观点各异、详略不一的解读。笔者本寄望于半年前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能对此有更为全面、准确的描述，因为回忆录的作者毕竟是该会议从头到尾的亲历其境者。惟读毕感觉写得尚算详细，而内中准确性则嫌不足，且多有可商榷之处。现根据手头上较为可靠的资料，沿吴文叙述顺序加以考证，不当之处，祈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会议准确名称及时间

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空军很快就引发了一场斗争，这就是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页570。以下引文出自同书者，仅注页数不再注书名。）

该次会议的全称，应为“中共空军第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可简称为“空军党委

三届十一次全会”，惟将“第三届”省略，不妥。一来就如不能把“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省略成“中共十一中全会”一样，不规范的叫法使后人弄不清届数；二来给读者的印象误以为空军党委自成立以来仅开过十一次全会，其实，加上第一、二届，远不止此数。

吴法宪将引发“斗争”缘由归究于“文化大革命”，后文还称：“说到底，这场斗争也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引起来的。”（页570）此说过于空泛，也不准确。引发争端的直接原因，最主要原因，是此前揭批罗瑞卿的斗争涉及到了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这一点，我们将会在下文重点谈及。

吴：“这次会议，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开始的，一直开到九月十日才结束。前后经历了三个多月。”（页570）根据空军官方资料，准确的会议时间，为1966年6月6日至9月8日。（1）

二、吴在会议前夕的西北之行

吴：“在这之前的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国西部上空进行一次空投氢弹的试验。……虽然具体的任务由兰州军区空军负责，而我作为空军司令员，应该亲自到试验现场去指挥。以防出现万一。”（页570—571）

吴法宪所指的这次核试验，是中国的第三次核试验，时间为1966年5月9日。官方对这次试验的准确说法，是“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试验的目的，是为氢弹设计提供实测数据，使参试人员加深对热核聚变规律的认识，但其本身并非是氢弹试验。此后，中国于同年12月28日进行了一次氢弹原理试验，而官方公布的首次氢弹试验，是在1967年的6月17日。（2）

吴：“就在临洮，余立金又来了电话，要我和成钧立即返回北京，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他说，对《五一六通知》要立即进行讨论，我不回去，他们没有办法讨论。这个电话刚刚放下，余立金又第二次来了电话，告诉我说，叶群要他转告我，要我尽快赶回北京，否则就会变成‘恩克鲁玛’了。”（页571）

恩克鲁玛（1909—1972），原西非加纳共和国总统，与中国友好。1966年2月访问中国期间，国内发生军事政变，其政权被推翻，后流亡并定居于几内亚。加纳政变发生在三个月前，林彪“五一八讲话”中也略有提及，叶群对此恐怕印象深刻，故有此告诫。惟笔者认为，如叶群真有此话，也是因罗瑞卿事件涉及刘亚楼可能会引致空军震动而起。但此后一个多月中，三届十一次全会果然因刘的评价问题酿成乱局，林彪、叶群为何却迟迟没有进一步指示？却是有点令人纳闷的。

与吴法宪同到西北的，是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值得一提的是，王年一曾引述吴法宪1980年10月14日交代：“在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以前，林彪曾多次同我说：贺龙要成钧当空军司令员，你要警惕和防备成钧夺你的权。”（3）惟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却再没有提及林彪曾说过这样的话。那末，吴法宪1980年的交代，是否也是在专案组压力下的向壁虚构？林彪是否压根就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三、空军党委常委会议

吴：“六月四日上午，我召集空军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五一六通知》的问题”，“谁知道会议刚开始，气氛就不同寻常，完全变了。首先是刘震，接着是曹里怀、王辉球等

人提出：‘你作为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对《五一六通知》不主持开会，不组织学习、讨论，躲到外面检查工作，迟迟不回北京，不抓‘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了什么？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按兵不动，是什么态度？’当时就向我轰了起来，上纲上线，给了我迎头一棒。我当时还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根本不知道，常委一些人已经在北京酝酿和串联了一些日子。在我回京之前他们已计划好了，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在空军闹一场，要把我拿掉。”（页 5 7 2）

吴文提及的 6 月 4 日的空军党委常委会议，空军的官方资料未有记录。而官方资料称：5 月 2 6 日，空军党委常委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常委 7 人，8 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研究部署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4）

“常委一些人”为什么胆敢“酝酿和串联了一些日子”？吴法宪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又称他们是“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这些，吴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笔者认为，最根本原因，还是中央工作小组在揭批罗瑞卿问题时对刘亚楼连带的严重批评，要借机会的话，借的也是后者。

1 9 6 6 年 5 月 1 6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在提及 1 9 6 5 年 2 月间刘亚楼分别向叶群、林彪转达了罗瑞卿“四条意见”后称：“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同志的思想情况、恶劣倾向及近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5）

这个报告所附的萧华 3 月 2 5 日在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上的发言更称：“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的关系就很不正常，和刘亚楼同志的关系也极不正常。当然，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的工具，直到临死才说出自己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6）

刘亚楼是个干事的人，优点不少，缺点也很多。作风强悍，也脾气暴躁，对人对事要求甚高甚严，批评人不留情面。空军这几个常委，在刘生前甚有受气的压抑感，现在看到中央文件说刘“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的工具”，不“酝酿”、不“串联”才怪！况且，既然刘、罗关系“极不正常”，在空军中与刘走得最近的、能对刘忍气吞声的吴法宪，受刘器重的余立金，那几个常委也满有理由怀疑他们与刘关系同样“极不正常”。

因此，刚刚下发的中央〔66〕268号文件，尤其是萧华发言对刘亚楼的指责，才真正是空军党委常委中“一些人”胆敢“在空军闹一场”的依据！

四、常委中的三派

吴：“好，我这一说，他们几个就都哄了起来，只见刘震带头，不仅曹里怀、徐深吉、成钧，甚至连谭家述、常乾坤、王辉球都跟了上来。常委里面，只剩下我和余立金、邝任农站在一起。张廷发在会议上不表态，他对刘震他们的行动不满，但是也不和我们靠在一起。看到常委会开成这个样子，真是让我伤心。”（页 5 7 3）

刘亚楼生前，空军党委常委会由以他为首的十一人组成。1 9 6 5 年 5 月 7 日，刘亚楼去世，5 月 2 7 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原空军政委吴法宪为空军司令员，任命原空军副政委兼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余立金为空军政委。同年 7 月 8 日和 8 月 2 6 日，中共中央先后批准余立金为空军党委副书记（此前余甚至还不是常委），吴法宪为空军党委书记。此时的空军党委常委

会仍由十一人组成，即：吴法宪（书记，司令员）、余立金（副书记，政委）、王秉璋（副书记，副司令员）、成钧（副书记，副司令员）、刘震（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司令员）、谭家述（副司令员）、常乾坤（副司令员）、徐深吉（副司令员）、张廷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辉球（副政委）。以上常委会组成情况至1966年5月并没有变化。（7）

据空军官方资料，邝任农当时不是常委，吴法宪上述记忆有小误。

在上述常委名单中，除刘震1955年授上将军衔、张廷发授少将军衔外，其余为中将军衔。刘震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委，行政职务为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和政委，惟在常委会内不仅排名于吴法宪、余立金之后，且还排名在另两位副书记、副司令员王秉璋、成钧之后。据说刘亚楼生前并不怎么喜欢他，给他安排的空军学院院长、政委，也不是什么要职，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在三届十一次全会上极力领头批刘亚楼。另外，王秉璋除为排名第一的副司令员外，同时还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主管导弹事业的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未有材料说明他有否回空军出席这次常委会和及后举行的三届十一次全会。

这样说来，假设王秉璋未有出席，常委中的三派应该是：1、吴法宪、余立金；2、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王辉球；3、张廷发。吴、余属少数派。

五、全会上的交锋

吴：“六月六日上午八点，我们在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礼堂正式召开了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九十多人，除空军党委委员五十多人以外，各军区空军的主要领导和空军领导机关二级部部长以上领导四十余人列席了会议。”（页573）

据空军官方资料：“出席会议的党委委员32人，列席30人。”（8）中共空军第三次代表大会1962年9月选出空军第三届委员会委员34人，时刘亚楼已去世，余33人，疑王秉璋未有出席，故而实出席者32人，加上列席30人，参加会议人数63人。

吴：“我讲了大约有十分钟。我刚讲完，几个常委就冲出来了。首先是刘震，然后是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徐深吉、王辉球和常乾坤，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抢着上台发言。讲的大致意思都差不多：空军的‘文化大革命’搞迟了，吴司令在西北躲风，迟迟不回来，迟迟不作讨论，不作决定，对中央的指示，对《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动，耽误了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他们几个这样一讲，立即就使得会场的气氛非常紧张。”“他们看到了当时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先例，就想借这样的—个机会，凭借着他们在常委会占多数的优势，来强行改组空军的领导班子，把我和余立金赶下台。”（页574）

常委几个人果真是“看到了当时中共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先例”，就想“借这样的—个机会”，“来强行改组空军的领导班子”吗？非也！根据我们的材料，他们借的，还是中央〔66〕268号文件，还是刘亚楼问题。

吴法宪的回忆里虽也谈到这几个人“对刘亚楼在世时的一些作风不满意，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这时想要借机发泄一通”，但将其放在次要的位置。不对，刘亚楼问题是主因！

有一本聂凤智（时为空军党委委员，南空司令员）的传记在谈及聂出席这次会议时称：“会议一开始就秩序大乱，吴法宪、余立金根本压不住台。有的对吴法宪、余立金义愤填膺；有的对刘亚楼痛心疾首。有的常委在说到刘亚楼一言堂、一长制、飞扬跋扈、压制民主时，竟痛哭流涕。会议一开始大家的矛头就异常集中：揭发批判刘亚楼、吴法宪、余立金、江腾蛟的‘罪行’或‘错误’。

“这绝对是不谋而合，或叫英雄所见略同吧。可能是由于空军内部的问题实在压得太多太久了。当然，中央268号文件牵扯到了刘亚楼是个重要因素。但如果说他们事先已有什么密谋，那是百分之百的捏造。”〔9〕

列席会议的北空党委代理书记、北空副司令员李中权后来对此回忆道，吴法宪在会议开始时称：“对已死去的刘亚楼同志和我本人都要发表意见”，与会者“对刘亚楼同志，特别是对吴法宪的作风问题、生活问题、工作问题、干部问题等等，列举了大量事实，提出了许多意见，我也在会议期间发了言。吴法宪装出一副可怜挨整的模样，只是低着头在本子上默默地作记录。”〔10〕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者，除了吴法宪列举的七个常委外，吴还说：“北京军区空军还比较好，没有跟着起哄，其他如沈阳军区空军的黄立清、南京军区空军的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的吴富善，都是些老资格，还有成都指挥所的高厚良、武汉军区空军的傅传作、廖冠贤等，他们和常委一些人结合在一起，哄啊、闹啊的，……。”（页576）而据李中权本人和聂凤智说，其实北空的李中权也在其中。

六、“刘亚楼问题”

关于刘亚楼在空军中的“问题”，聂凤智在全会期间于6月14日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颇为典型。聂称：用中央军委立空军为标兵的三条理由衡量，显然不够。一是抓两头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实际上，“上头”就没有抓好。刘亚楼主持空军工作期间，毛主席的许多指示，如关于未来战争战略方针问题的指示，大军区传达了，空军都听不到；有时传达了，又用自己的话讲，让人分不清哪些是毛主席的指示，哪些是刘亚楼自己的东西，搞得思想十分混乱。因此，空军党委并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个第一”也更谈不上“落实”。二是党委班子团结好，有个好班子。什么好班子！党委常委内只有刘亚楼的“一言堂”，根本没有其他成员的应有地位，本身就没有搞好团结。三是要求严格，雷厉风行。其实是打着严格要求、雷厉风行的旗号，通过生硬粗暴的做法，大搞惩办主义，形式主义，使得空军内部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相互吹捧，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加上刘亚楼本人有些问题也影响极坏。“如果放到下面”，聂凤智最后结论说：“任何一级党委，都应属于烂掉了的单位！”〔11〕

会议上批刘的火药味十足，“与此同时，下面部队如武汉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沈阳军区空军等，却由于在学习268号文件中揭发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纷纷打来电报开始向空军党委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12〕

6月19日晚，空军党委在研究如何答复下面部队的意见时，大多数人认为精神是好的，是贯彻和执行中央指示，应该表示鼓励。只有刘锦平（空军党委委员，民航总局政委）说，电报中有许多严重的不健康因素。聂凤智站起来大声说：“不能同意刘锦平的看法！以前刘亚楼主持空军工作，下面不敢对空军党委提意见；谁提意见，谁有一点个人独立的见解，谁就会遭受打击。现在刚刚提了一点意见，就说人家是不健康因素，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是无法让人信服的！”聂凤智甚至提出，刘亚楼不能“盖棺论定”，而应“盖棺重定”！〔13〕

〔66〕268号文件引致的批刘的偏激情绪正在蔓延。至7月初，南京空军空四军所辖的驻江苏盐城的空31师和盐城基地，突然给空军党委发来一份电报。电报列举了刘亚楼的许多错误，以及提到刘亚楼就无法避开的空军党委其他一些领导人的错误。电报措辞极为强烈，最后向空军党委提了三条要求或建议：“撤消刘亚楼的讣告和悼词，重新评价；将刘亚楼的骨灰搬出八宝山；改组空军党委现有的领导。”〔14〕

事情一到极端，就会产生变化，就会走向反面。这一变化，我们会在后面再谈到。

七、总政工作组与叶剑英、贺龙的介入

吴法宪说，全会甫一召开，几个常委就要求军委派工作组来。“但结果，军委决定不派工作组。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好因病休息，副主任刘志坚便以总政的名义派来了个工作组。工作组由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愈之为组长，包括青年部副部长萧麦萍等三人。他们来参加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住在空军招待所。此外，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也直接派了他的秘书李文芳来参加空军党委的十一次全会。”（页 577—578）

吴的意思，似是说总政工作组由刘志坚个人决定派出，事实恐非如此。没有军委、总政主任萧华的同意，刘志坚不可能这样做，况且，萧华本人也正是批刘的干将，当然，他也没有料到事情后来会发展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吴说组长叫胡愈之，不确。胡愈之另有其人，总政组织部副部长是胡友之（1914—1998），原一野的政工干部，1961年的少将。此外，说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也不妥，准确的说，是“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吴：“总政工作组一来到空军，常委的一些人就很快同他们搞到了一起。那段时间里，总政工作组的人见到我和余立金，不说话，不握手，还拉长了个脸，表示和我们疏远。可是见到刘震、成钧、曹里怀他们就亲热得很，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有了总政工作组的支持，常委的一些人就更加踌躇满志，对我和余立金冷嘲热讽，甚至谩骂。当然，总政工作组三个人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萧麦萍就和胡愈之的看法不一致。”“叶剑英办公室的秘书李文芳是个师级干部，他一直站在我们这一边，始终是支持我们的。他认为，空军党委常委一些人的搞法不对头，完全是一种罢官夺权的地下活动，是小组组织行为，风头不对，所以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告诉我：‘要沉住气，让他们放。’”（页 578）

吴法宪说，李文芳的态度“显然代表了叶帅的一些看法”，（页 578）这当然是一种推测。而事实上，叶剑英6月份的态度似更不偏不倚些，6月9日，叶剑英专门给空军常委写了一封信，内称：“空军党委领导核心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党委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经常思想见面，相互间要经常提意见。对其他同志的错误不要当作某种资料去收集，看到同志有了错误，要随时提出来，不要使问题成堆。希望你们这次会议是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胜利的会议，是团结的会议。”（15）

在叶的讲话里，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倾向性。

吴：“与此同时，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又到了军委副主席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说，空军党委正在开会，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据说贺龙当时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这个情况是真是假，我闹不清楚。因为我当时没有直接见到贺帅。这些话我当时并不知道，都是以后成钧他们自己做检讨时讲出来的。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都同时说到了这一点。”（页 579）

吴说的“与此同时”，联系上下文，是1966年7月初，应误。根据吴法宪、余立金1966年9月3日给林彪的报告，应为“大概是6月19日晚饭后，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等三人到贺龙同志家里，贺龙同志主动问及空军党委全会情况，说了一些看法，和林副主席、叶副主席的看法是对立的。”（16）

《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则称，贺龙当时说过：“看来，空军这个标兵是有些问题。过去不但你们受了蒙蔽，我们也受了蒙蔽，林副主席也受了蒙蔽。有问题揭开来好。有问题不揭，将来捂[捂]出大事来，那损失就大了！”（17）

按中央〔66〕268号文件精神，贺龙的说法表面似无什么大碍。但贺龙错在：一、未经与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商量，对空军高层的矛盾匆匆表态，有越权之嫌；二、其政治敏感度显然不足，未有预料到几句话就可以激化矛盾。对比起来，叶剑英的处事手法就圆滑、聪明得多。

八、林彪、中央相继表态

吴：“大概是到了七月初，在连续批了我们一个来月之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对我们采取措施了。于是，由刘震牵头，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署名，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控告信。这份控告信一共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概括了大家在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有十条是对着我的，拉了这样一个材料。当时林彪在大连休养，这封控告信由刘震打电话到大连，找到‘林办’的秘书，将信的全文传了过去。”（页579）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如何将信的全文即时“传”过去？不清楚。据吴法宪说，林彪在得知信的内容后，对叶剑英称：“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该批评，但是这种作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页580）

林彪的原话是否如此，也不清楚。但说常委几个人“罢官夺权”，倒是多种材料一致的说法。据吴法宪1980年10月14日的交代，林彪当时说：“在空军现在这个领导班子中比较起来还是吴法宪、余立金比较正，刘震、成钧等人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是不允许的。”（18）

林彪同时对海军的会议情况也作了表态。林彪称：“海军现在领导不能改变，肖、苏两同志的领导不能改变”，“要自己洗澡，互相擦背，提高思想，但不能夺权”，“肖、苏要支持李、张去工作，李、张要维护肖、苏的威信。”（19）

为什么海、空军党委的会议同时内斗了一个月后，林彪迟迟才予明确表态？文革中有一个说法：“林彪同志当即识破了这一阴谋诡计，为了让这一小撮牛鬼蛇神充分暴露，故意暂时不予回击，但却一直密切注视会议的动向。”（20）空军参加会议的一些高级干部，如李中权，是相信这一说法的，但事情真相是否果真如此？则恐怕永远难以弄清了。

范硕说，叶剑英听了林彪对海、空军党委全会、扩大会议的意见后，“在当晚就报告了邓小平，小平说他完全同意。第二天7月4日在刘少奇那里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和军委常委贺龙、聂荣臻、陈毅和叶剑英都参加了。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由邓小平亲自记录。

“一、党绝对不能允许搞地下活动，刘少奇特别指出，犯错误，路线错误是第二位的错误，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应该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公开讲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二、肖劲光、苏振华、吴法宪、余立金四同志，已经进行了自我批评，不够的，以后还可以再讲。常委其他同志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挖一下。

“三、用党委全会和党委扩大会议这种方式撤换领导的做法是错误的。”（21）

范硕这本书，内容丰富，惟内部发行，印量极少（仅200本）。以后由他主编、公开发行的《叶剑英传》，类似关键性的内容已经删去，删去的原因，恐怕是因为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央常委的意见，与林彪是一致的吧。

九、解决空军问题的军委常委会议

吴：“七月二十日上午八时，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在北京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召开。军委常委到会的有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四位老帅，林彪照例没有出席，陈毅因工作原因也没有到会。根据军委指示，空军党委会全体成员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总政工作组的成员没有参加这个会议。”（页581—582）

根据多种可靠材料，吴文上述军委常委会议的时间有误。准确时间应为7月11日。同时，陈毅出席了这次会议。

范硕称：“7月11日，继解决海军问题之后，中央军委常委开会，集中讨论空军问题。

“会议由贺龙同志主持。

“贺龙首先说明，最近中央常委召集军委常委同志开了一次会议，陶铸同志也参加了，专门讨论了海军和空军的问题。他先请叶剑英进行传达。

“叶剑英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专为解决空军问题而召开的。空军建军以来，据说已经开过六十多次全会了。中央、军委是很信任你们的，从来没有象这次会议这样来抓。

“他批评空军前一段会议，不象个老干部开会，象个小孩子开会，讲了些错话，作了些错事，弄得军委不能不出来过问。他说：‘等到你们陷下去了，再要我们这些老年人来抬你们，就抬不动了。因此，这个会是非开不可的。’

“叶剑英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针对空军常委中有人搞小动作，企图撤换空军两个第二把手的问题，提出批评。他形象引用三国人物的典故，批评某些人‘罢官’‘夺权’斗争，真是‘天下英雄谁敌手，可惜今日无曹刘。’”（22）

范硕说“企图撤换空军两个第二把手”，恐有笔误，当时常委中几个人要撤换的吴法宪、余立金，是空军的第一、二把手。“可惜今日无曹刘”中的曹刘，既指三国时的曹操、刘备，也暗讽空军中的曹里怀、刘震，此曹刘非彼曹刘也。

范硕写道，叶剑英讲完后，空军常委十一人先后表态发言。一致表示拥护中央、军委和叶的意见，多数人主动检讨自己的错误。在听取空军常委各人发言过程中，叶和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陶铸时有插话。贺龙、叶剑英、徐向前在发言中，强调对刘亚楼要一分为二，刘亚楼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不能撤销刘亚楼的讣告，“抓活刘亚楼”。

范硕还说，张廷发在发言中，表示拥护中央的指示，说有人搞“串连活动”，批评徐深吉等活动得最厉害。他说：“徐深吉同志说他受到刘亚楼的害最深，其实刘亚楼对你和小姨子的问题，处理得是对的。”

《聂荣臻年谱》则记录有：“7月11日上午，出席第五十三次军委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空军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聂荣臻在会上说：“空军建设已有十多年，应该肯定是有成绩的。我

们建设一支空军是不容易的。这虽然不能归功于刘亚楼一个人，但刘亚楼是有一份的。……你们硬是要把刘亚楼搞得很臭，说标兵也是假的，硬要把空军几十万人搞得灰溜溜的，这是否有利？这是一个关系到几十万人的荣誉问题，这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我很担忧……中央已经明确指出，搞地下活动的性质最严重。”（23）

到了此时，军委常委包括贺龙，意见一致，都是支持吴、余，批评空军党委常委中的几个人。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自此风向逆转。

十、追究贺龙

吴：“大概是八月七日，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八月九日，林彪把我找了去，要了解一下空军全会的情况。当我讲到成钧他们四个人曾经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空军全会的一些情况和贺龙的表态时，林彪说：‘这件事，你要他们写一个材料，然后送给我。’

“回到空军，我就找到成钧他们四个人，要他们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写出来。然后，我和余立金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将这些材料送给了林彪。我们还附了一封短信。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现送上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四人所写的材料，请阅。现在看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所以开成这样，是因为有两条线操纵着。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一条红线，贯穿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始终；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在控制着这次会议。’（页590—591）

据王年一转引的吴法宪1980年9月4日交代，林彪约他去汇报的时间是在8月中旬。另王文转引了吴法宪、余立金1966年9月3日给林彪报告的部分内容，该报告除附了成、黄、傅、廖四人写的材料外，还转述了广空司令员吴富善1966年8月20日对贺龙的揭发，然后说：“我们觉得空军党委这次全会所以在会议前期方向偏了，是和贺龙同志在上面的幕后活动有很大关系的。”林彪将此报告和所附材料报送毛泽东。（24）

王文转述的报告中并没有红线、黑线之说。按报告用语推断，王文所转述的文本可信度较高。1966年9月初，贺龙还未被打倒，吴、余的报告是否就敢说贺龙是黑线，很值得怀疑。如果报告中没有这样的提法，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又何必抹黑自己呢！

我们上文曾提及贺龙6月份的谈话虽然不妥，但起因是受到中央〔66〕268号文件的影响，况且贺龙在7月份中央表态后已转变了态度，到了8月，林彪尚要追究贺，政治器量似偏于狭窄而欠宽宏大度。但我们难以弄清的是，追究贺龙，究竟是毛的，还是林彪本人的意思？有关贺的报告，是毛要的，还是林彪主动送的？

十一、尾声

吴：“根据林彪和叶剑英的指示，我们在向军委写了报告并得到批准后，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宣布了停职检查的决定。”（页591）

吴法宪说，对刘震进行停职处理，是因为这次风波是他挑的头。但为什么还要对张廷发也进行停职检查？吴认为张有严重脱离群众的致命弱点，刘亚楼在世时，一度曾经想把张培养成为接班人，使张更加蛮横和目空一切，对空军一些老人很不尊重，并且与司令部工作人员的关系也搞得很僵。“大概是军委领导对张廷发这个人的情况也有所耳闻。叶剑英副主席听到了下面的一些反映，要李文芳转告我说：‘张廷发可以停职，他太脱离群众了。停职不是撤职，教育一

下，转变过来了，还可以复职嘛！’

“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我和余立金一起给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请示对张廷发进行停职。报告送上去以后，很快就批了下来。在张廷发被停职的问题上，我们只是被动地执行军委领导的决定，甚至可以说军委作这样的决定还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至于军委领导为什么要决定停张廷发的职，我至今也不清楚具体原因。

“根据军委领导的指示，除了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进行了停职检查的处理以外，对其他人我们则一概不动，只是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训，团结共事，共同搞好工作。”（页592）

根据多种资料综合可以得知，空军党委于1966年8月20日以刘震为“彭黄反党集团成员”、“在空军搞罢官夺权”上报军委，9月12日，军委令其“停职反省”。而张廷发的罪名，则是“罗瑞卿在空军的代理人”，“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罗瑞卿分子”，并非“脱离群众”这么简单。张在七年后方恢复工作，于1973年5月重任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更迟于1975年8月恢复工作，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三届十一次全会在最后阶段调整了党委常委成员。除刘、张外，党委常委中其他参与“罢官夺权”者，包括成钧，都没有动，都未作组织处理。10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吴法宪为空军党委第一书记，余立金为第二书记；增补罗元发、邝任农、刘锦平为空军党委常委，罗元发并为副书记。调整后的常委会由十二人组成：吴法宪（第一书记，司令员）、余立金（第二书记，政委）、王秉璋（副书记，副司令员）、成钧（副书记，副司令员）、罗元发（副书记，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空司令员）、曹里怀（副司令员）、谭家述（副司令员）、邝任农（副司令员）、常乾坤（副司令员）、徐深吉（副司令员）、王辉球（副政委）、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25〕

9月7日，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叶剑英和总部领导萧华、杨成武、张宗逊、彭绍辉、张爱萍、刘志坚、邱会作、张池明、杨勇、廖汉生等接见了参加全会的人员。接见后，叶剑英、杨成武作了讲话。9月8日上午，吴法宪在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会议于当日结束。（26）（2007年4月）

注释：

〔1〕〔8〕〔26〕空军政治部编研室：《空军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2），页248。

〔2〕见《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16〕〔18〕〔24〕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北京：《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6期）。

〔4〕同〔1〕书，页247。

〔5〕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268号，1966年5月25日发出。

〔6〕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268号附件三，萧华：《坚决保卫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篡军反党的阴谋》。

〔7〕空军政治部：《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1集（北京：蓝天出版社，1991），页11，33—34。

〔9〕松植：《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页301。江腾蛟，1962年至1966年12月为南空副政委，与刘亚楼关系密切。1965年5月余立金调任空军政委后空军党委原拟提江为南空政委，因反对声音太多而作罢。1966年12月7日被任命为南空政委兼空四军第一政委。

〔10〕李中权：《李中权征程轶事文集》（北京：蓝天出版社，2001），页404。

〔11〕同〔9〕书，页303。刘亚楼生前，空军被树为全军标兵。当时有此一说：“全国学

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空军学南空，南空学空四军”。

〔12〕〔13〕同〔9〕书，页304—305。

〔14〕参见〔9〕书，页308—309。

〔15〕范硕：《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叶剑英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纪实》（广州：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广东叶剑英基金会，2001），页47。

〔17〕同〔9〕书，页306。

〔18〕〔19〕同〔15〕书，页44。肖，肖劲光；苏，苏振华；李，李作鹏；张，张秀川。

〔20〕《空军内两个司令部的殊死搏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字023部队红总《红总战报》第8期，1967年9月18日。

〔21〕同〔15〕书，页44—45。

〔22〕同〔15〕书，页47—48。

〔23〕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1021。

〔25〕同〔7〕书，页34—35。

~~~~~

## 【研究探索】

### “文化大革命”八十问

• 王年一 •

费正清说：“文革”是当代历史悲剧中最深刻的一幕。（1986年8月28日《文摘报》）邵燕祥提出建立“‘文革’学”的建议（见《文汇报》1986年第4期所载《建立“‘文革’学”雏议》）。四川省青年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学术理论部于1986年7月召开了“对‘文革’的历史反思”讨论会。据《理论资讯报》1986年9月22日报导：“与会者一致认为：‘文革’作为一场浩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乱，其历史之长，涉及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对‘文革’的研究的历史价值是丰富而巨大的。它可以说是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绝妙的‘展览馆’和‘资料库’。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人物都在这场运动进行了最充分的表演；中国历史上所积淀的种种弊端、恶习也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因此，给‘文革’下政治结论还仅仅涉及了它的一个方面，并且仅仅是研究的开端而远非终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创造‘文革学’的动议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我在《漫谈“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编入《怎样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一书）中谈了肤浅的意见。现在再谈谈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呢？可以说，所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没有一个已经研究得很透彻。这里不可能列出所有的研究题目，只能举例说明。

#### （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弄清“来龙”才能够弄清“去脉”。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就是研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已经总结出一些最重要的教训，有待于科学地阐明；更多地教训还有待于总结。

与研究“文化大革命”其他问题比较起来，现在研究“文化大革命”由来的人多起来了，议论纷纷。提出各种见解。这是好事。许多说法表面看来不相同，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说的，并不矛盾。有的说法是否正确，还值得考虑。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还是粗线条的，并未充分展开。诸如以下一些问题，需要科学地加以说明：

1、“文化大革命”的由来，一般从1957年说起，总的说来这是正确的。但是历史不能割断，可不可以上溯若干年？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大体上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这一历史阶段中作为支流或者末流的“左”的偏差（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左”的偏差、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左”的偏差、经济建设中的“左”的偏差）与1957年以后的错误有什么样的关系？

2、八大开得很成功，八大作出的许多重要论断是很正确的。但是任何认识总是要受到时代的限制。八大也有不足的方面。（《胡绳谈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编写问题》指出：“如果认为这个决议〔按指八大的决议〕完全正确，已经完全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性的问题，我以为不能这样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这一说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什么问题？八大没有宣布过渡时期基本结束，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说：“党中央委员原来预计，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将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证明，为了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是必要的。或者还需要更多一点时间。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基本上完成，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除个别地区外，就可以全部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将为我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准备好必要的条件。”（《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07、226—227页）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什么问题？八大也没有宣布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消灭，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什么问题？总之，八大有哪些不足的方面，它与1957年以后的错误有没有关系？

3、反右派究竟是怎样造成的？这与毛泽东1956年关于党内一百万知识份子主要代表富裕中农的认识（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02页）有没有间接的关系？所谓“右派分子”在1956年、1957年事实上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不少有益的甚至宝贵的意见，把这些意见定为“右派言论”说明了什么问题？据《报刊文摘》1985年6月18日报导：青年作者沉杨在题为《论1957年》的文章中，提出以下见解：1957年我国为何骤然兴起一场风暴般的“反右”？我国的历史为何从此揭开了极不正常的一页？结论决不是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国际上的“反华逆流”，更是区区不足以挂齿。历史迅猛地前进，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象：要求有科学知识管理技能、现代心理素质的大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业）产生了，管理它的却是农民、手工业者出身的干部！这个矛盾，在解放初期，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我们拥有纺织业、面粉加工业这古老的工业部门的时候还没产生。或只是初见端倪。而在1956年至1957，已经是十分突出了。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新形态。它的社会表现，是管理者与生产工作者之间的矛盾，是官僚主义、瞎指挥这种社会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不大醒目，被我们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掩盖着。土改、合作化、公私合营完成以后。敌对阶级间最引人注目的矛盾基本解决了，多年的对立面的消失、地位的日高，使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拉开了。贪图安逸、官僚主义便日益成为突出的问题。总之，1957年的风暴之根源，是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所谓的“右派进攻”，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沉杨的认识是不是正确呢？更重要的问题是：除了冤屈了几十万人（其中有不少我国著名的知识份子）并且波及更多的人而外，反右派斗争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4、舒文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发生‘文化大革命’是经济理论、经济政策上左的错误发展的结果。发动‘文化大革命’没有经济基础，这个要明确。但是，没有经济基础不等于说没有经济上的原因，没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上的原因。”（《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座》第59—60页）这是《历史决议》的观点。但是，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大跃进”是如何形成的，这当中有什么严重的教训？“一大二公”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1958年提出的建立人民公社的主张的实质是什么？“大跃进”与1

1959年庐山会议、八届十中全会、“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着怎样的联系？《历史决议》所说的“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表现在哪些重大问题上？何以加以误解或教条化？毛泽东何以认为“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

《历史决议》所说的“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是哪一些？党内上层在经济建设上有哪些分歧？这些分歧是怎样演变为所谓“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邓力群在《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说：“‘大跃进’碰了钉子，遭到了困难，毛泽东同志的心思转到阶级斗争上去了。”为什么他的心思要转到阶级斗争上去？邓力群在这本书里又说：“他（按指毛泽东）自己对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上没管，专门注意去搞阶级斗争，催促各个地方抓社教试点。”这又说明了什么？等等。

5、《历史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没有经济基础”。李南熏在《在旧经济体制模式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经济根源》（载《理论内参》1968年第2期）里论旧经济体制模式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经济根源。李南熏之说是否正确？严家其、高皋在《“文化大革命”再思》（载1969年7月15《文汇报》）中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其根源深藏于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形成的经济政治体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说法有所不同。他们得出结论“50年代的道路是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6、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能不能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能不能说社教的失误是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的失误？

7、“反修”是个重大问题，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关系太紧密了。邓力群在《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说：“乔木同志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的时候说，如果没有国际的反修，那国内的反修防修的任务很难提出来，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对60年代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应当怎么看？从原则上讲，不能认为全部是错的，也不能认为全部是正确的，有对的方面，也有错的方面。”高放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反修”都是不正确的，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搞修正主义。高放的意见与邓力群的意见未必是完全对立的，一则邓力群承认“不能认为全部是正确的”，再则他们所说的“修正主义”的含义有所不同。邓力群说的是“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高放说的是系统全面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恐怕不包含“对外追求霸权”这样的内容。黎澎也完全否定了“反修”，他在《通向“文化大革命”之路》（载1986年9月22日《世界经济导报》）中，在回答“那么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初衷究竟是什么——革文化的命？还是像1942年在延安一样，为进行政治斗争，先进行一场思想运动？”这个问题时说：“现在看来还是政治斗争。他对身后之事不放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但他所凭藉的，从思想方面来说，第一是教条主义。第二是个人崇拜。这就是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有了这两条，人们就疯狂地‘反修’，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如果我们再往前看几年，看到1964年、1962年、1960年，就会看出，那时的‘反修’，是教条主义已经极端化的表现。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更僵得连弯都拐不过来了。”（引者按：过去全党有教条主义的问题；如果就毛泽东来说，不是什么教条主义的问题。）黎澎完全否定了“反修”，这里的“修”，恐怕也不包括“对外追求霸权”这样的内容。显然，以前说陶里亚蒂搞了修正主义，说南斯拉夫搞了修正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以前说苏联全面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不正确的。全党怎么弄错了的？在哪些重大问题上弄错了？这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联系异常紧密，应该作科学的具体的说明。

8、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认为中央搞了“修正主义”？他所说的“中央”是指中央第一线还是指中央某一位或某几位领导同志？他为什么会得出错误的认识？

9、《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

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能不能用以说明我们过去的个人崇拜现象？个人崇拜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有人说七大前后就开始有了，有人说1957年以后才开始有，有人说，个人崇拜早就有了，但只是支流或者末流，1957年以后才成为严重的弊病。哪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

10、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的关系如何？在《通向“文化革命”之路》中，黎澎说：“个人专断是个人崇拜的基础。个人崇拜从哪里来的？还是由于个人专断”戴晴说：“我理解的同好相反，没有个人崇拜，专断是专断不成的。”黎澎又说：“不然。个人崇拜，从眼下看，至少再出这样一个人是不容易的。而个人专断是普遍的，到处都有，基础广大，与中国小农经济联在一起。也就是说，一是有人要人崇拜；二是有人要去崇拜。你想想，萌芽在哪里？就在个人专断。能不能说两种说法都有点道理，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相互助长、互为因果？

11、毛泽东写出过《关于健全党委制》这类著作，也论述过民主集中制，以“霸王别姬”的故事告诫专断而不改正的人，何以自己犯了个人专断的错误呢？毛泽东晚年个人专断，有人认为受了封建思想的影响，有人认为是小农思想的反映，这些看法符合事实吗？有人认为，这些看法表面看来深刻，实际上流于空泛，根本不能说明毛泽东晚年的个人专断；毛泽东晚年的个人专断，根本原因在于他要维护自以为正确的“左”倾主张。毛泽东知道个人专断是不好的，但既然坚持自己的“左”倾主张，就不得已而为之。对付不同意见，也就损害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这种看法符合事实吗？

12、是《历史决议》指出的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还是毛泽东利用了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

## （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13、“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黎澎在《通向“文化革命”之路》里说：“1966年开头恐怕是想把运动范围框在文化之内，革文化的命。”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14、在“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出现了不少极为反常的现象。如毛泽东让江青组织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却对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保密？明明是毛泽东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却偏偏要在《纪要》的标题上加上林彪委托，这些说明了什么？

15、有一种观点：在“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里的种种反常活动，主要矛头实际上是对着中央第一线的。批判《海瑞罢官》，不过借题发挥，实际上指责了中央第一线过去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批判所谓“文艺黑线专政”，当然指责了文艺界，更重要的是指责中央第一线搞出了个“文艺黑线专政”。批判彭、罗、陆、杨，更是直接指责中央第一线了。在准备阶段，实际上对中央第一线已不信任。这种看法是否正确？

16、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什么？这个初衷是否正确？邓力群在《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乔木同志说，如果毛泽东同志活着的话，很想问问他，究竟发动‘文化大革命’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说，他估计，毛泽东同志也很难回答清楚。”毛泽东恐怕确实很难回答清楚。这说明了什么？

17、在准备阶段里。毛泽东对形势是怎样估计的？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否已经基本形成？或者说，这时已经形成了哪些主要论点？1966年的“五七指示”，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18、“‘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这个说法本身意味着什么？

19、在准备阶段里，中央第一线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如何？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如何？

20、准备阶段的种种问题，集中地暴露了哪些弊端？

###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

21、“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体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内容是什么？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什么？

22、《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指出：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前，毛泽东对于会议的议题、文件都一一作了具体指示和安排。”“当时毛泽东在外地，由刘少奇主持会议。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这说明了什么？中央第一线实际上是不同意《五一六通知》的。但是通过了。这又说明了什么？历史地看，会议有没有可能抵制错误？

23、江青等人在会外进行了哪些实际上反对中央第一线的活动？她何以能够进行这些活动？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是林彪的思想吗？为什么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对林彪的讲话感到不安，而中央却转发了林彪的讲话，而且评价如此之高，这是为什么？

24、《五一六通知》是错误地批判彭真和中央第一线的产物，是“左”倾的纲领。它通篇在表述上都有含混、笼统、旁敲侧击等特点。连张春桥也说过他当时不知道“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谁。仅就这个特点来说，它又不像个纲领。这是怎么回事？

25、“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可以不可以说是踢开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闹“革命”？

26、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极为重要的资料，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要害是什么？

27、“牛鬼蛇神”并没有确定的含义，巴金说它翻译成外文是“妖怪”、“黑帮”、“保皇派”等也没有确定的含义，使用这类词语定罪，说明了什么？

28、围绕着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的斗争的实质是什么？“工作组”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批判派工作组、批判工作组的实质是什么？批判派工作组、批判工作组的后果是什么？何以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状态？高等学校广大师生之间的分裂状态是怎样造成的？

29、最初出现的“红卫兵”的宗旨是什么？毛泽东何以赞赏和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30、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8月4日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极其严重地指责了刘少奇和中央第一线，又改变全会议程，说明了什么？《十六条》是极其错误的，但是它有没有比较正确的方面；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实质是什么？中央领导机构既已改组。为什么还要把“文化大革命”开展下去？为什么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说经毛泽东同意把“接班人五条”改为三条。这说明什么问题？《十六条》既已勉强通过，全会闭幕后在运动的领导上为什么不按《十六条》办事？中央既已有了新的领导机构。毛泽东为什么不尊重新的领导机构。而以“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央的集体领

导？

3 1、为什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八一八”大会（“首都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林彪在大会上所作的打倒一切、破“四旧”的讲话起了什么作用？毛泽东为什么同意这个讲话？

3 2、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破“四旧”的情形是怎样的？它造成怎样的灾难？

3 3、对红卫兵运动应该完全否定，但对红卫兵要作具体分析。红卫兵运动有哪些危害？对红卫兵应该作怎样的分析？

3 4、全国大串连是怎么搞起来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北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和红卫兵？中央、国务院为什么在1966年9月5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师生来京参观？

3 5、1966年存在不存在所谓“资反路线”？毛泽东为什么执意要批判“资反路线”？批判“资反路线”受到哪些抵制？批判“资反路线”的恶果是什么？为什么出现了毛泽东意料不到的无政府的混乱局面？

3 6、1966年8月以后存在许多矛盾的现象：说的是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实际上支持打、砸、抢、抄、抓；说的是“文化大革命”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实际上支持打击几乎所有领导干部；说的是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实际上挑动群众斗群众；9月中旬发出文件要求“抓革命促生产”，转瞬间下发两个“十条”：要求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这是怎么回事？

3 7、1966年年底，局势已很严重，这是错误发展的必然，当时却认为“形势大好”。为什么在对形势的基本估计上发生如此大的偏差？

3 8、支持上海所谓“一月风暴”为什么不经中央讨论决定？江青一伙何以能够把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非法地打下了台？有一种观点：支持并且号召夺权既基于幻想，又出于无奈。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有一种观点：“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不是制定《五一六通知》时就想到的，甚至也不是制定《十六条》时就想到的。而是批判“资反路线”的恶果，是犯了严重错误又不自觉其为错误因而加以坚持的恶果。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3 9、号召全国全面夺权，当时是不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把问题看得太简单？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毛泽东的意图常常不能实现，为什么？

4 0、许多部队开始“支左”时都支持了所谓“保守派”，都犯了所谓“错误”，这说明了什么？

4 1、《公安六条》当然是极端错误的，有没有比较正确的一面？

4 2、为什么“大联合”始终搞不起来？这对运动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

4 3、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十条命令。八条和十条是不一样的，变化很大。为什么变化很大？

4 4、“二月抗争”是大义凛然的斗争。在具体做法上、表述上有没有不够周到之处？陈毅



1967年2月16日在怀仁堂会议上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XXX、XX，还有XXX、XXX。XXX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上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陈毅的这番话说明了什么？

45、号召全国全面夺权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有着什么关系？为什么全面内战难以制止？是怎样一步步地走上打倒一切的邪路的？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此文是毛泽东审阅过的。它极为蛮横地给刘少奇扣上“假革命”、“反革命”、“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帽子。何以会发生如此反常的事件？这对打倒一切有着怎样的影响？揪所谓“叛徒”，违反党的有关规定。由群众组织来揪，没有确定的标准，打击一大片，残酷斗争，逼、供、信，任意株连，是完全错误的，错误也是显然的。为什么要号召揪所谓“叛徒”和实际上允许这样搞？

46、所谓“革命大批判”，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若干“权威”的批判文章，是十分值得研究的。为什么从1967年4月起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它在哪些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它反映了怎样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在手法上有哪些特点？它造成了什么危害？

47、武汉“七二〇”事件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大规模的抵制行动，是值得认真地进行专题研究的。武汉军区何以支持“百万雄师”？“百万雄师”何以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不听中央文革的话？“百万雄师”何以愤慨？“七二〇”事件的爆发有没有必然性？偶然因素是什么？“七二〇”事件揭示了什么？对“七二〇”事件所作错误处理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48、为什么1967年7、8月间局势发展到掌握不了的程度？毛泽东1967年7月至9月视察华东、中南和华北地区时所作指示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在政策上有哪些改变？为什么既解决了一些问题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什么又转发林彪的“八九”讲话？这里有什么严重教训？

49、揪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又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号召在全国揪“五一六”？是不是仅仅为了反对污蔑周恩来？为什么始终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揪“五一六”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50、为什么制造出“杨、余、傅事件”？

51、为什么开展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活动？它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为什么政策界限模糊？

52、为什么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提出“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舞台”，出于何种考虑？

53、所谓“全国一片红”说明了什么？有一种观点：“全国一片红”既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所想到的，也不是号召全国全面夺权时所完全料到的（毛泽东在1967年说过“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是错误的），而是号召全国全面夺权的必然结局。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另有一种观点。打倒那么多领导干部，并非毛泽东的本意，他始终不赞成打倒一切（毛泽东1967年3月说过对干部一概排斥、一概打倒是错误的）；但是坚持“左倾指导方针必然打倒一切。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54、九大的召开一再延期，这说明了什么？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请说明这是错误发展的必然。

#### （四）关于“文化大革命”第二阶段

55、所谓“斗、批、改运动。问题极多。为什么要提出“斗、批、改”？“斗、批、改”的本质是什么？各项“斗、批、改”活动总的说来是错误的，错误是如何形成的？有的活动是不是有合理的因素？何以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斗、批、改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56、邓力群在《介绍和答问——学习〈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同志要搞掉刘少奇同志，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他的那套观点得到实行。就需要有林彪这个人。他已经认定了刘少奇同志必须整倒，要在两个中间进行选择。这个选择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选择。但是在党内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基础。拿我来讲，过去不知道林彪跟毛泽东同志的争论，觉得林彪不但政治上行，而且会打仗。管好中国这个国家，中国这个党，光懂政治不懂军事，不行。据我的接触，当时有这种看法的人不少。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选择。不能说不包含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对林彪的看法。”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林彪成为“副统帅”？

57、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都进了中央政治局，又说明了什么？

58、有一种观点：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有难解难分的两个方面：一是林彪要当国家主席，二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互争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两个集团争权夺利更不能忽视。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59、当时为什么不设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1970年8月23日晚何以作出讨论、学习林彪23日讲话的安排？九届二中全会何以不按民主集中制解决分歧？何以到会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觉察林彪的阴谋？从党内政治生活的角度看，有什么严重教训？

60、一个元帅、党中央副主席，为什么要逃跑？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如何阐明这个重要的论断？

61、林彪集团有哪些不同于江青集团的特点？

62、“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林彪集团，有哪些不实事求是之处？

63、有一种观点：粉碎林彪集团是毛泽东的功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毛泽东能够粉碎林彪集团。如果不粉碎林彪集团则后患无穷。问题在于，此后在实际上更加重用江青集团了。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64、1972年，毛泽东为什么同意“四人帮”反对批判极左的意见？

#### （五）关于“文化大革命”第三阶段

65、毛泽东为什么提出“批孔”的问题？“批孔”的实质是什么？江青一伙何以又嚣张起来？中央为什么转发江青个人关于“批林批孔”的信件？江青一伙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

套，把矛头指由周恩来，既肆无忌惮，又隐晦曲折，这是怎么一回事？

66、江青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干尽了坏事，他们何以能够为所欲为？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态度，前后有哪些变化？为什么到最后也不下干掉江青一伙的决心？有一种说法：毛泽东越到后来越厌恶江青，因为她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得过紧，而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以对江青除了批评批评而外无可奈何。主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不能单从江青有特殊身份上去解释。这种看法是否符合事实？国外有一种说法：江青一伙是“文革派”、“激进派”。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67、在九大以后，每到“权力再分配”时总要发生问题，这说明了什么？《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又说明了什么？

68、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实质是什么？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实质是什么？毛泽东1974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因何而发？与“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关系？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什么关系？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理论上有哪些错误？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准发表？

69、毛泽东多次批评“四人帮”，实质是什么？起过哪些作用？有一种观点：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起过很大作用，在客观上是粉碎“四人帮”的武器，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70、为什么要开展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1975年底，毛泽东显然并不要打倒邓小平。是怎样迅速走上打倒邓小平的歧路的？

71、请准确地说明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由来。

#### （六）其他

72、邓小平说，“如果说，我们总结的经验有很多条，那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极重要的一个论断。请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来说明这一论断。

73、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怎样形成与发展的？

74、“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有一些在毛泽东意料之中，更多的在他意料之外。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间的估计，有过多次变化。这是怎么一回事？

75、在《在通向“文化革命”之路》中，戴晴问：“您认为，类似‘文化革命’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还会不会重演？”黎澎答：“历史总会重复的，特别在基础不变或几乎未变的情况下；但它决不可能在原地原样重复。历史的发展是螺旋状，这是谁都知道的。圈子转得有时候密一点，有时候疏一点，不一样。如果老在原处转，进步就停滞了。当然人物情节可能不同。但性质总是相近的。比如早两年有人想重演‘文化大革命’，虽然时间很短，但也有点似曾相识的样子。”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76、邓力群在《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更好地进行探讨，除了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中间的实际情况

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之外，还需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现象的科学方法。建议同志们对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认真读一读恩格斯1890年写给约布洛赫的一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1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提出“合力”说。请运用“合力”说分析“文化大革命”。

77、舒乙在1986年9月6日《文艺报》上发表文章，谈“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杀现象。文章说：“自杀”这个词在一个相当不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了一个很忌讳的词儿。有一个时期，这个词是用一句完整而恶狠的话来代替的，叫做“自绝于人民”。以后，到了为冤假错案平反的时候，又换了一个似是而非，叫人摸不着头脑的片语，称之为“非正常死亡”。在正规的悼词中往往称之为“含冤去世”。总之，碰见这几句话，不用问，准是自杀的意思。究其来由，可能是来源于这样一种假定：凡是加入革命队伍的人，都应是准备为正义进步的事业而奋斗终身的，如果自杀，便是放弃战斗，等于背叛了那事业。那么，接下来的逻辑，这种行为理应地被视为是可耻的。然而，这个假定，和由此导出的清规戒律，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在中国历史上，屈原和田横五百壮士的自杀，多少年来一直在亿万人民心中享有极高的声誉，被当成教育子孙后代的绝好教材。在国外，在受到亿万群众敬仰的伟大人物之中，自杀而亡的也不乏其人。从来没有人因为他们的自杀而轻蔑他们。他们的名字是保尔拉法格、萝拉马克思、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杰克伦敦、海明威由此看来，我们自己的非此即被的简单分类法倒是值得重新审视。最值得认真具体分析的是十年内乱时的自杀现象。这一时期的自杀有三大惊心动魄的特征：一是超高百分比，创下了骇人听闻的可悲的新记录；二是全方位分布，包括了一切党派、职业、年龄、职位；三是集中了一批最优秀的人，看看下面这个极不完整的名单便无需过多的解释了：李立三、阎红彦、老舍、傅雷、邓拓、吴晗、翦伯赞、以群、闻捷、海默、杨朔、上官云珠、严凤英、筱白玉霜、容国团。“文革”中的自杀者成为一批倔强的叛逆者、抗议者。他们的历史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舒乙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请以事实为基础，说明“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杀现象。

78、上官冰在《虔诚的整人和谈整》（载198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中说。“当时，至少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绝大多数人无不相信是‘好人’整坏人，是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整‘一小撮’。可怕的是这个绝大多数里面，绝大多数是好人，他们正是在号召之下，凭着这个信心，理直气壮地去‘整’那‘一小撮’，或者赞成别人去‘整’，或者不反对别人去‘整’。更加可怕的是被‘整’的人里边，也有相当一些人虔诚的相信，或者努力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确是‘修正主义分子’，应该被‘整’，才可以得到挽救，即便不是‘修正主义分子’，也总是有错误，被‘整’得痛一点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他们的处境迫使他们比群众虔诚地相信这一点，才活得下去，否则‘牛棚’里就不可一日居了。如果没有这一切，如果一边只是一群‘打、砸、抢’的暴徒，一边都是清醒的自知无罪无辜面遭冤受屈之士，‘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搞起来的。”请研究这种复杂的现象。

79、严家其、高皋在《“文化大革命”再思》中说。“近几十年来，不少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不可阻挡的经济改革潮流，而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对这一伟大改革潮流的顽强的抵抗。”在一定的意义这么说，是深刻的。请加以研究。

80、邵燕祥在《建立“‘文革’学”刍议》中说：“‘文革’学”要对“文革”作多层次系列性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在“‘文革’学”中，对于具有特殊的历史作用和代表性的人物如江青，不仅应有专章立传，而且要考虑开设“江青学”。邵燕祥的意见是应予考虑的。我们对林彪、江青研究极少，而研究林彪、江青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应该说，难度很大。

以上列出80条。重复地说，这只是举例。可能有些重要问题没有提到。

~~~~~  
【文革一页】

“文革”时，我被囚于秦城监狱

• 李敦白 •

李敦白，美国共产党员，1945年来到中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长期在广播事业局任职，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李敦白曾两度因间谍嫌疑含冤入狱，尤其是第二次——1968年被拘禁在秦城监狱后，直至1977年才获释放，狱中生活长达十年。

李敦白移居美国后，花三年时间写出了自己的回忆录。下面摘登的是回忆录中记述第二次狱中经历的片断，小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 年轻的朋友

牢里总有一两个人不畏环境，对我表现出友好。一天早上，我听见有人在拍牢房的门，我走到门洞前往外瞧，看到一个年轻的看守站在门口。

“你为什么被关进来？”他轻声问。

“我不应该告诉……”我说。

“我知道你，”他说。“你看起来不像是个坏蛋。我观察你很久了。你看我们的报纸看得很认真，也遵守我们的规则，不违反纪律。你把东西吃得很干净，连掉在地上的米粒也捡起来吃。你把牢房打扫得很干净。”在一段长长的沉默后，他继续说：“我已经决定帮你。你最需要的是有人跟你说话。我会在这个点再待两个星期，只要我值班，我们就可以说话。但是走廊那头的门一打开，我就得马上离开，这点很要紧。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跟你说话。”

这点我很清楚。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竟愿意为我冒险，如果他被人抓到跟一个被指控犯有通敌罪的特务在文革期间交往，是有可能被枪毙的。

我一直没看见这个年轻人的长相，但是我们一起讲了两周的话。“不要太在意他们说的话，”他告诉我，“坚持说实话。如果他们威胁你，你也不用担心。这些都会过去的。不要激怒他们，他们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他谈到他自己，他服役过的地方，还有来到这个城市前的农村生活。他在电视上看过我得到毛主席会见，问我那是什么感觉。他也想知道我在美国的生活，我就告诉他我在南方组织劳工和人权活动的事。

他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我所待的监狱是最高级别的秦城监狱。在我入狱的这段时间，北京许多著名的地方都已经改成监狱，像前门饭店，还有我曾经待客的有名的四川饭店。他还告诉我，我的朋友中至少已有一人入狱，他是爱泼斯坦，波兰出生的历史学家。

在他值班日期接近尾声时，他试着安慰我说，“你现在多大岁数了？”

“47。”我说。

“哦！不要担心，过了50岁你一定可以重新为人民服务。”

他是出于好意。可是我却感到一阵寒意。还要再待三年吗？他的意思是说我的案子还要三年才能结案吗？但事实证明，他的猜测其实还是太过乐观了。

◇ 悼念周恩来

我很早就知道周恩来已经不行了。报纸的照片上，他的脸越来越瘦，充满了压力和痛苦。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报上虽然只字不提，但是我心知肚明。尤其从我看到的他最后上报的照片来看，置他于死地的癌症已经很明显的写在脸上了。

他的逝世震动了整座监狱。一天清晨，我听到奏哀乐的声音，声音从外面传来，十分响亮。我听到走道上有哭声，就走到门前探问。“怎么回事？”我问一个走过的警卫。

“周总理。”他说。只说了这么一句，我便从门洞上看到他的眼睛红了。我一下也哭了。我断断续续哭了三天。为周恩来，也为我自己和家人，更为这个似乎刹那间被遗弃的中国而哭。

我头一次在监狱觉得不再孤单，因为整座监狱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悲伤。警卫和犯人连在一起了。我可以听到隔壁牢房里有人在啜泣，也听到走廊上的哭泣。每个人都在哭。我听到一个年老犯人的哭声，从遥远的另一头传来：“中国失去最后的希望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会怎么样？”

所有人都在哀悼。第二天，我看见普通安全人员和看守都戴上了黑纱。我便也撕下黑棉裤的裤脚，给自己做了条黑纱。不多久，一个警卫走到我门前，打开窥视口冲我大叫：“你披着那个想干嘛？”

我吃了一惊，眼泪滚下脸颊。

他的态度突然变了，尴尬地看着我。“绑好！”他粗声说，“快掉了。”

中国失去了一个伟大的领导，而我，虽然知道周恩来也是授令逮捕我的人之一，仍然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伟大的朋友。

◇ 天安门广场事件

晚春的某一天，全中国的人民都在追悼死者。这一天叫清明节，是人们祭扫坟墓、追念先人的日子。这一年的清明节，举国上下都在哀悼周恩来的逝世，同时愤怒谴责那些反对他的人。《人民日报》的大标题写着：“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制造暴乱。”报道很简单，但令人费解，只说坏分子以悼念周恩来为藉口，聚集在天安门前，殴打人民解放军的警卫，还冲击人民大会堂。共有一万人聚集在那里。当晚，北京的工人自卫队进驻广场并驱逐那些坏分子。报上暗示说，这次事件完全是邓小平挑拨。邓小平本来已经重新担任了副总理，但周恩来一死，他又被打倒了。

那天早上10点钟，我读到这则消息。下午两点钟，我又被带到审讯室，这是四年来的第一次。审讯室里有三个年长的干部，看样子就知道是公安部的人。

“你读过今天早上的报纸了吗？”他们问我。

“是。”我说，“我读过了。”

“对于这则报道，你有什么感想？”

“我读到坏分子在天安门广场制造事端，而且还攻击革命军人。不过这则报道中有些事情我不了解。”我觉得我又要给自己惹出大麻烦来，可是嘴还是不停地说话，“我不明白背后主使怎么会是邓小平？我大概知道他这个人，我想对他还是有些了解的。他也许犯过各种严重的错误，可是我个人绝不相信他会唆使流氓无赖去攻击人民解放军。他是军队里出来的，军队是他的根。”

我等着受处罚，但是他们却都笑起来。这又是唱的哪出戏？我想，看样子他们不像是耍我，他们真的觉得高兴。“另外还有一件事，”我继续说，“报上提到周恩来总理的方式十分轻蔑，说‘以悼念周恩来总理为藉口’。那是什么意思？用这种方式谈论总理，算什么？”眼泪滚下我的脸颊。

“你知道中国的政治很复杂。”一个审讯员说，“有各种暗流、各种因素。我们并不指望你从报上的一则报道就能看清所有的事。”

我满头雾水地回了牢房。

◇ 狱中的江青

那年秋天，毛泽东逝世。我又一次听到哀乐响起，工作人员把喇叭架在门外的走廊上。接下来好几个礼拜，我们听到收音机里不断报道一代伟人毛主席逝世，毛主席的生平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吊唁，然后是毛泽东的葬礼报道，更多的宣布和哀乐。我的反应却令自己都无法理解。在我心中，毛泽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智慧超人、天赋卓绝，是完美的哲学家和战略家，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也是世界革命的先驱。与周恩来相比，他的逝世对中国和世界有更深远的影响。但当我听到毛的死讯时，却流不出一滴眼泪，一滴也没有。

“监狱里的人会怎么想呢？”我自问。我的心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会没有眼泪、没有沉痛的哀伤，也没有个人伤怀的悲怆？而事实上，我也不需要担心什么。因为身边的看守、安全人员或其他犯人都没有表露太多的情绪。

随着毛泽东的逝世，报纸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而隐晦的涌动。就算我被孤立在狱中，仍然可以感觉出，有大事即将发生。这从毛泽东葬礼前后的发言中便可初见端倪。我从来没有在党报上读过当权的两派如此对立的言论。江青一再重申她宣称的毛泽东遗言：坚持现行政策，即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而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却只字不提毛的遗言。

五六天后，报纸上所有关于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消息戛然消失，可谓十年罕见。不但照片没有了，连他们的报道和行动分析也没有了，任何跟他们有关的重要字眼一律销声匿迹。

此举的效果十分惊人。自从我入狱后，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监狱外的田野里传来任何声音。农民都在默默地喂猪种粮食。但是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锣鼓喧天的音乐透过邻近公社的大喇叭传过来，农民们载歌载舞，敲锣打鼓，铙钹齐响，四出游行。笑声和中国民乐器高亢的声音响彻八方。连着几天的下午和晚上，爆竹噼噼啪啪，响遍了沉寂多年的大地。

在监狱里，欢乐的气氛虽然节制得多，但仍存在。我有好几年没见到有人笑了，但有天早上，一个年轻的医生来我的牢房里替我抽血体检，她笑得合不拢嘴。我问她怎么回事。

“是好事呀。”她说。

“什么事呢？”

“你马上就知道了。”她说。

又过了几个星期，有一天我听见有个女人在叫，声音似乎是从院子那边，正对我的牢房里传来。这个声音很熟悉，又高又尖，半哭地叫道：“噢，毛主席！噢，毛主席！我会永远对你忠心不二！”

那哭声就像是中国葬礼上的职业送葬者。“为了你，我不在乎我得受什么苦。噢，真正的革命者在世界上要受怎样的苦呀！同志们，别怀疑，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声音我有九年没听到了，但是我很肯定就是她，千真万确。

是江青。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虽然尽力保持更文雅的谈吐，但她讲话时忽高忽低的鼻音和上海口音，却仍然存在。现在，她又把她做政治演说时惯用的那一套戏剧化音调使出来。

“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别人咒骂的，”她悲泣道，“我们是在诅咒和打击下出生、成长、兴旺的。”她是在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时的讲话。

管她的看守不为所动。隔着院子，我听见另一个女子的声音：“老实点！”显然这是女看守。对于那种骂人的方式，我经过这几年已经熟得不能再熟。她是那种强悍的乡下妇人，没有太多感情，纯粹公事公办。她不准听江青的废话。“闭嘴！”她吼，“你造的孽还不够吗？你看看我们待你多好。你骗了太多人了，别以为你用那一套就可以躲过。照我的话做，要不然我就给你好看。”

有时我会听到一种声音，好像是江青在撞门，然后是推挤的声音。我猜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也被关在这里。我曾经听到王洪文在放风时试着联系其他人。“小弟！小弟！”他叫，“大哥在想你。”

我不觉笑了笑。文化大革命初期在上海，我就已经认识了王洪文。他喜欢吹嘘自己是棉纺织厂工人，但其实是工厂保卫处的。他曾经得意洋洋地告诉我说，他如何装病混进医院里，晃过那些计划开批斗会批判他的对手。在狱中，我从报纸上读到这个投机分子的故事，看他爬到国家领导核心的最高层，唏嘘感慨。而今他也倒了。

院子那边的犯人带来的影响令人惊讶。短短几天内，牢房的情况改善了。他们在我们的牢房里装上喇叭，让我们听音乐和新闻。牛奶和苹果现在每天都有。看守们开始跟我交谈几句。突然之间，监狱里开始有种惺惺相惜的氛围，彼此交换当年在那个女人手下或多或少的受罪感。

一次看守来我的牢房带我出去放风时，那个女人又开始高声尖叫。我看看看守，说：“又发作了。”我把头对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点了点。

“她得跟这里的人一样守规矩。”他说着，嘴角笑了笑。

从他们的名字在报纸上消失的一刻起，我就明白江青和她的同伙已经失势，现在她跟我关在同一座监狱里，我更确定这种改变是真实的。我知道我的命运也将有所改变。我早就怀疑，江青和安全部门头子康生是我被捕的幕后主使。我知道我很快就会获释，只是还要多久？一个

星期、一个月，还是一年。官僚作风本身也是造成耽搁的原因。我又开始变得紧张恐慌。释放的脚步越近，等待的日子就越艰难。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